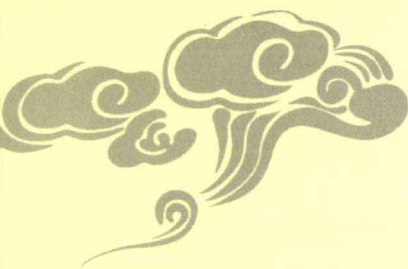


古代文学教学

古代文学教学



兰州大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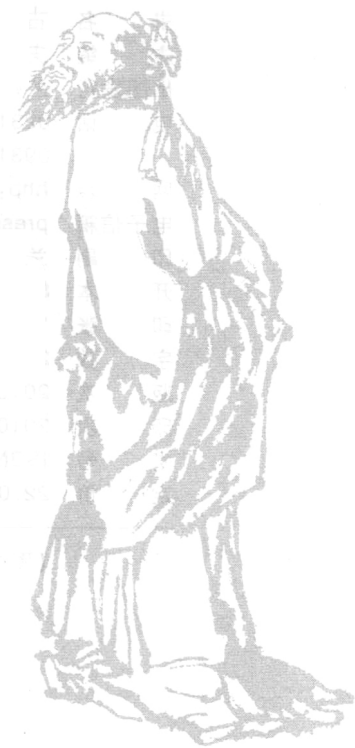
古代文学教学

热点难点

述论

宁俊红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文学教学热点难点疑点述论/庆振轩,胡颖,
宁俊红主编.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9

ISBN 978-7-311-03602-7

I. ①古… II. ①庆…②胡…③宁… III. ①古典文
学—中国—教学研究—高等学校 IV. ①I206.2-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85882 号

策划编辑 锁晓梅
责任编辑 钟 静
封面设计 管军伟

书 名	古代文学教学热点难点疑点述论
主 编	庆振轩 胡 颖 宁俊红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com.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9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602-7
定 价	22.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胡适的《诗经》研究	白宪娟(001)
司马迁“发愤著书”说平议	庆振轩 张馨心(014)
论李白以文为诗	
——兼及李白韩愈豪放风格的不同	丁恩全(024)
穷愁之言易好 欢愉之辞亦工	
——韩愈不平则鸣说平议	庆振轩 张馨心(030)
韩愈“以诗为戏”论	丁恩全(039)
赵翼论韩愈	丁恩全(049)
唐宋八大家得名过程平述	孟丽霞(058)
古代散文史上的韩柳优劣论综述	庞广雷(068)
白居易思想分期研究述评	宋继栋(075)
《长恨歌》研究述评	朱伟杰(085)
《琵琶行》研究述评	朱伟杰(092)
西昆体研究争议评述	杨长英(098)
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说平议	张馨心 庆振轩(107)
苏舜钦“以文为诗”考说	杨许波(119)
王安石词研究述评	张燕(128)
宋词词序研究述评	朱伟杰(135)
苏辛词异同比较研究述评	吴清(141)

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论争综述	李凤英(150)
秦观诗歌研究综述	林春香(158)
宋代说话四家研究评述	李孟霏(163)
江西诗派评价争论述评	杨长英(174)
读古人文字当知其短处	
——从读书论看李清照的《词论》	庆振轩(189)
谁谓荼苦 其甘如飴	
——杨万里诗论别解	庆振轩 车安宁(202)
陆游婚姻悲剧琐议	张馨心(207)
严蕊《卜算子》考论	张馨心(214)
元佚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本事考	胡颖(219)
元佚杂剧《驴皮记》本事考	胡颖(229)
明清文艺思潮述略	张玉(233)
中国古典章回小说的叙事视角浅解	
——以四大名著为例分析	孙小霞(245)
《三国演义》人物形象塑造的争议及其认识	姜帅(257)
近十年来《金瓶梅》主题研究述评	王雯(269)
《红楼梦》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比较的研究综述	吴守斌(275)
中国古代曲论中的“本色”论	姜帅(291)
戴名世与桐城派的关系研究述评	宁俊红(306)
清代桐城派的确立与发展述评	宁俊红(314)
《儒林外史》人物画廊	杨波(322)
梁启超“新文体”名称与特点研究综述	王丽萍(337)

◎ 白宪娟

胡适的《诗经》研究

翻检胡适的作品,既看不到《诗经》研究的皇皇巨著,亦不见几篇完整的《诗经》研究文章。说起来,在胡适的研究中《诗经》所占学术分量实在少得可怜。但《诗经》研究却如影随形般终其学术生涯,从早年留学国外便发堂皇新论到暮年探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时,仍不忘品评朱子《诗经》研究的特色,指点《诗经》音韵研究的得失与门路;去大学演讲时,也不妨拿《诗经》作题目饶有兴趣地讲上一番。像胡适这样学术明星式的人物,其一言一行都会引起学界的瞩目,而且凭借其过人的胆识与魄力,胡适的《诗》学影响亦波及后代学人,故而也就值得我们费番工夫去探讨一下胡适的《诗经》研究。总的来看,胡适的《诗经》研究主要集中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文字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集中讨论《诗经》的文章、文字。如《诗三百篇“言”字解》、《论汉宋说诗之家及今日治诗之法》、《为朱熹辨诬》、《致钱玄同——谈〈诗经〉的研究大旨》、《谈谈诗经》、《论〈野有死麋〉书》、《论长脚韵》、《入声考》、《周南新解》、《论〈诗经〉答刘大白》、《覆丁声树书》、《汉书地理志的诗古义》、《论“于”“以”的两封信》;一类是在日记或著作中对《诗经》的较为集中的论述。前者如1921年4月27日、1922年4月26日、6月9日、8月19日等日记,后者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其他如《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研究国故的方法》、《再谈谈整理国故》等文章中亦有三言两语的涉及。为了能从如此零碎的





《诗经》研究中得到一些系统的认识,本文拟作以下三方面的探讨。

一 胡适的《诗》学观

胡适幼入私塾读书,受到塾师的特殊照顾,实实在在地学了些东西。这段私塾教育使他在12岁之前对《诗经》就已耳熟能详了,进而产生好感,每每在日记中谈及对《诗经》研究的见解想法,即使身处异国,也不忘用西洋文法整理《诗经》中的虚字。于1925年发表的《谈谈诗经》,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胡适对《诗经》基本问题的看法。

1.《诗经》的性质及价值

胡适明确提出“《诗经》不是一部经典”,而“是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并声称《诗经》“是世界最古的有价值的文学的一部”。^[1]之前的《诗》学或有异端排弃汉宋儒者的诗说,但几乎无一例外地视《诗经》为承载王道教化,担负美刺讽谏任务,神圣而不可侵犯的经典,并由此生出占据《诗》学主流的毛《传》、郑《笺》、《诗序》之流穿凿附会,陈腐古板的解经语。轮到胡适说《诗》时,他以清晰明白的话语,毫无回旋余地地一口否定《诗经》圣经的地位,并与此种观念作决然地对立,“假如这个观念不能打破,《诗经》简直可以不研究了”。这种观念对《诗》学界的震撼不啻于一场法国大革命,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精神在《诗》学领域的扩展延伸。正因对《诗经》经的观念自觉而有目的的反动,才导出之后丰富的、多角度的《诗经》研究。

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胡适视《诗经》为“一部古代歌谣的总集”。对此提法,学界多有争议。反对者如夏传才先生,他认为:“所谓‘歌谣总集’说,是个不确切的观念。”回护者则称歌谣是相对于经典而提出的,是借以与经学划清界限的,是对文学性、非经典性的强调,并认为“把‘歌谣’与‘诗歌’的意义彻底割裂开来,只会使我们的理解出现偏差和障碍,抹杀了作品的时代要求和胡适对《诗经》研究的开拓之功。”^[2]区区私意为胡适所言“总集”或无大碍,但其所下“歌谣”一语则有失严谨。胡适极为推崇民间文学,对歌谣亦不陌生,并曾专门撰文《论歌谣的比較的研究法的一个例》探讨歌谣研究方法。显然在胡

适看来,歌谣是指那些源于民间,与文人创作有所区别的诗歌。且胡适原本十分清楚:“《国风》来自民间”,“《大雅》、《小雅》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卿大夫做的”。^[3]在对《诗经》所收诗歌的性质不同有明确认识的前提下,仍作出如此论断,反映了胡适立论的轻率。再者,恢复《诗经》文学真面目便是对“经典”的反拨,又何必定以“歌谣”二字相对?

在肯定《诗经》文学性的同时,胡适充分认识到《诗经》的史料价值,认为《诗经》“可以做社会史的材料,可以做政治史的材料,可以做文化史的材料”,并据此而读出“《野有死麋》一诗最有社会学上的意味”。^[4]认为《诗经》具有史学价值本不自胡适起,亦不自胡适终。其特异之处在于社会、政治、文化的着眼点,既不同于传统学者幌以对《诗经》史料价值的强调,实以对封建伦理观念的宣扬,又不同于现代史学家纯粹史学角度的利用,它启发了《诗经》研究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多角度尤其是文化角度的开拓发掘,有助于对《诗经》丰富内涵的认识和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

2. 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问题是《诗》学史上除《诗序》外的又一大公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首提孔子删诗之说,班固著《汉书·艺文志》进一步补充证成此说,除此之外,并无其他史料可以佐证孔子曾经删定过《诗经》。至唐孔颖达为《诗谱》作《疏》时提出异议:“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司]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之后反对赞成之说一时云起,经南宋和清乾嘉学者多角度、强有力的反驳,孔子未尝删诗几成定论。胡适承反对一派,认为“孔子并没有删诗,‘诗三百篇’本是一个成语”。其理由是:“假如原有三千首诗,真的删去了二千七百首,那《左传》及其他的古书里面所引的诗应该有许多是三百篇以外的,但是古书里面所引的诗不是三百篇以外的虽说有几首,却少得非常。”全然是历史上非删诗派的观点,并没有提供更新的论证,只是“‘诗三百篇’是个成语”的提法有些新意,但也只一笔带过而已。





3.《诗经》的结集与作者

《诗经》中收录了自周初至春秋中叶上下五六百年间的诗歌,地域涉及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湖北北部的黄河和长江流域。对于这样一部历时长久、地域广泛的诗歌集的辑成方式,历来有采诗、献诗、作诗三说,其中对采诗制度的有无,人们争议较大。对于《诗经》的辑成,胡适认识到“《诗经》里面包含的时期约在六七百年的上下”,故而主张“《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也“不是那一个人辑的”,“是慢慢的收集起来”的,特别指出“《国风》是各地散传的歌谣,由古人收集起来的”。具体来说,“民间有了什么可歌可泣的事,或朝廷官府有了苛税虐政,一班平民诗人便都赶去采访诗料……几天之内,街头巷口便东采一只小调,西抄一只小热昏,編集起来,进给政府。不多时,苛税也豁免了,虐政也革除了。”^[5]此论虽是针对古代诗歌而言的,但也未尝不是对《诗经》结集方式的概括。这段言论实际表达了胡适对采诗制度的认可。因为“《诗经》不是一个时代辑成的”,在胡适看来,《风》、《雅》、《颂》的结集则定要界域分明地辨出先后来,于是断言“最古的是《周颂》,次古的是《大雅》,再迟一点的是《小雅》,最迟的就是《商颂》、《鲁颂》、《国风》了”。据此认为《诗》分《风》、《雅》,不是“内容或性质上的区别”,而只是“时代上的区别”。^[6]对于这些论断,胡适只是在文章、日记中一语带过,未作详细论证,使我们无从知道其立论依据,虽可备一家之言,但多少带有武断的成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认为《国风》中的“歌谣产生的时候大概很古”,虽没有具体谈到底古到何种程度,但启发了我们对《诗经》原始文化内涵的探讨。胡适对《野有死麋》等诗诗义的新解则是作出的具体示范。

“《诗三百篇》的作者,绝大多数都不可考。后世典籍所载,也多难以据信。”^[7]只有几首诗中提到作者的较为可信。但“《诗经》作者的职业、身份,大致却可推测而知。”^[8]在这方面,胡适作出了较为精当地论述:“《大雅》、《小雅》里有一部分是当时的卿大夫做的,有几首并有作者的主名。”

4.《诗经》研究史

胡适一方面对汉至清代的《诗经》学史作出简要的概括：

《诗经》到了汉朝，真变成了一部经典。《诗经》里面描写的那些男女恋爱的事体，在那班道学先生看起来，似乎不大雅观，于是对于这些自然的有生命的文学不得不另加种种附会的解释。所以汉朝的齐、鲁、韩三家对于《诗经》都加上许多的附会，讲得非常的神秘。明是一首男女的恋歌，他们故意说是歌颂谁，讽刺谁的。

后起的《毛诗》对于《诗经》的解释又把从前的都推翻了，另找了一些历史上的——《左传》里面的事情——证据，来做一种新的解释。《毛诗》研究《诗经》的见解比齐、鲁、韩三家确实是要高明一点，所以《毛诗》渐渐打倒了三家诗，成为独霸的权威。

到了东汉，郑康成读《诗》的见解比毛公又要高明。所以到了唐朝，大凡研究《诗经》的人都是拿毛《传》、郑《笺》做底子。到了宋朝，出了郑樵和朱子，他们研究《诗经》，又打破毛公的附会，由他们自己作解释。他们这种态度，比唐朝又不同一点，另外成了一种宋代说《诗》的风气。清朝讲学的人都是崇拜汉学，反对宋学的，他们对于考据训诂是有特别的研究，但是没有什么特殊的见解。他们以为宋学是不及汉学的，因为汉在一千七八百年以前，宋只在七八百年以前。殊不知汉人的思想比宋人确要迂腐的多呢！但在那个时候研究《诗经》的人，确实出了几个比汉、宋都要高明的，如著《诗经通论》的姚际恒，著《读风偶识》的崔述，著《诗经原始》的方玉润，他们大胆地推翻汉、宋腐旧的见解，研究《诗经》里面的字句和内容。

于历史回顾中看出“二千年来《诗经》的研究实是一代比一代进





步的了”。同时指出“虽说是进步的,但是都不彻底,大半是推翻这部,附会那部;推翻那部,附会这部”。另一方面,将《诗经》研究彻底改革的任务承担起来,认为凭着“新的眼光,好的方法,多的材料,去大胆细心地研究”,效果“比前人又可圆满一点了”。复旦大学博士章原所作博士论文《古史辨〈诗经〉学研究》对胡适的《诗经》研究史进行了总结,将其高明之处列为三点:“a.超越今古文、汉宋学之争,以客观公正的态度进行研究;b.以进化论的立场看待《诗经》学史;c.对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推崇显出非凡的眼光、魄力。”所言甚是。对出于门户之见的《诗经》研究,胡适则极力反对,他批评清人说:“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工。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9]

5.其他

以上四点,胡适都作出了相对集中的论述。对其他《诗》学问题胡适亦有零星涉及。如对“兴”的认识,胡适同意古人的说法,认为“兴”是“一种无意义的起头话”^[10],认为《诗经》中没有史诗。不过胡适用了“故事诗”一概念,对比上下文义则可知此“故事诗”即史诗一概念。其言“《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11]再如,胡适认为“《周南》、《召南》就是楚风”,因为“二南”中很多处提到江水、汉水、汝水的地方,而这正是楚的疆域。

二 胡适《诗经》整理的主张

整理国故运动虽不是由胡适率先发起的,但毫无疑问他是这场运动中最具热情、最投入、最活跃的分子。一篇《新思潮的意义》为整理国故运动立下纲领,又以《〈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整理国故的方法总论。《诗经》研究是胡适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新思潮

的意义》提出“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后,胡适在继续以往对《诗经》的思考的同时,努力找寻系统有效的《诗经》整理方式。这一点从胡适日记及整理国故的相关文章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试举几例:

1921年4月27日日记记录对于《诗经》的几点独立见解中提到:“关于训诂一方面,当用陈奂、胡承珙、马瑞辰三家的书作起点,参用今文各家的异文作参考”,“当注重文法的研究;用归纳的方法,求出‘《诗》的文法’”,“当利用清代古音学的结果,研究《诗》的音韵”。认为这样就“可以求出《三百篇》的真意,作为《诗》的‘新序’”了。^[12]

1922年4月26日日记提出要用歌谣、社会学与人类学的知识来帮助《诗经》的研究,并提出:“用文学的眼光来读《诗》。没有文学的鉴赏力与想象力的人,不能读《诗》。”^[13]

1922年8月19日日记开列出《胡适试做的诗经新解》的研究计划:“(1)序说:先列举‘旧说’,先秦及自汉人到龚橙、方玉润,不加评论,但使人看古人可以有随便瞎说的自由”,“次举‘今说’”,是胡适自己的诗序。“(2)训诂:a 动植物不详注,如关雎仅注‘是一种水鸟’。b 凡古今字今人不能了解的,皆用简明的‘集注’法,于毛、郑、朱……胡承珙、陈奂、马瑞辰诸家内,酌取一个最满意的解说。间列己意。c 古字有今字可举时,皆为举出。如‘流之’之‘流’等于现在南方之‘撈’,北方之‘捞’;如‘芼’字等于今之‘摸’。d 绝对的注重文法,故最注重所谓‘词’(虚字)。(3)校勘:择取四家诗异文及古书引诗异文之重要者。(4)音韵:暂从阙,将来请玄同补作。(5)写法:用新诗写法,每‘句’为一行,每章为一段,注重标点符号。”^[14]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提出三点研究古学的主张,即“扩大研究范围”、“注重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15]从“历史的眼光”出发,主张“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16]将“系统的整理”分为三种:“索引式整理”、“结帐式整理”、“专史式整理”。整理的目的是要“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的价





值来。”^[17]而《诗经》“二千年研究的结果,究竟到了什么田地,很少人说得出的,只因为二千年的《诗经》烂帐至今不曾有一次的结算。宋人驳了汉人,清人推翻宋人,自以为回到汉人;至今《诗经》的研究,音韵自音韵,训诂自训诂,异文自异文,序说自序说,各不相关连。”^[18]因此,对《诗经》进行整理成了一件当下迫切要去做的事情。

《再谈谈整理国故》中提出四种整理方式:“1.最低限度之整理——读本式整理;2.索引式的整理;3.结帐式的整理;4.专史式的整理。”^[19]其中第一项整理的具体方法是校讎、训诂、标点、分段、介绍,并“选了《诗经》来做第一种方式的整理——即读本式的整理”^[20]。并以《诗经·大雅·公刘》中的“于胥斯原”的“胥”字为例,将之解作一地名;又将《召南·采蘋》“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一章加上标点,成为“于以采蘋?南涧之滨;于以采藻?于彼行潦”^[21],使诗义变得清楚明白。

《谈谈诗经》中将《诗经》研究具体归结为两条:“(第一)训诂,用小心的精密的科学的方法,来做一种新的训诂工夫,对于《诗经》的文字和文法上都从新下注解。(第二)解题,大胆地推翻二千年来积下来的附会的见解;完全用社会学的、历史的、文学的眼光从新给每首诗下个解释。”

综合来看,胡适《诗经》整理的主张大体包括序说、校勘、音韵、训诂、写法(标点、分段)五项。对于这些主张,胡适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亲自动手去做,是他不多的《诗经》研究中用力较勤的一部分。胡适希望通过这样的整理,弄懂诗篇的意思,使《诗经》成为“普通读本”,“使一般读者能读能解”。^[22]唯有如此,才“可以使大多数的学子容易踏进‘《诗经》研究’之门”^[23],在胡适看来,这是普及工作。“入门之后,方才希望可以希望他们之中有些人出来继续研究那总帐里未曾解决的悬帐:这是提高。”^[24]由此看来,胡适的《诗经》整理不只是盯在基础性研究上,而且意识到了对《诗经》作深层次研究的必要性。然而两千年的《诗经》研究留下的只是“一屋子的烂帐簿”^[25],当务之急自是对《诗经》烂账的整理,结账尚且不暇,评判是非的工作必然要留待后人了。

胡适《诗经》整理的具体实践集中体现在《周南新解》、《谈谈诗经》以及留美时期所作后收入《古史辨》第三册的《诗三百篇“言”字解》三篇文章中,在日记和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亦有相关文字。

《周南新解》于1931年发表在《青年界》1卷4号上,完整实践了胡适《诗经》整理的主张。对《周南》11篇诗歌进行了重新注解,每篇注解均包括四部分内容:诗歌原文、字词训诂、旧说罗列、今说新解,每一部分内容都融入了异于传统的新质素。诗歌原文采用新式写法,分章段抄录并加以西式标点,使诗歌显豁易读。字词训诂方面,训释词义,校勘文字。较为新鲜的是对西方文法的吸收,如《葛覃》注3对“于”字的解释,胡适将与“黄鸟于飞”同类的例子罗列在一起,并与“焉”字的用法进行对比,归纳出用“于”字时“都用在所形容的字之前”^[20]的规律。《诗三百篇“言”字解》是胡适最早的借鉴西方文法进行字词训诂的文章,运用的是胡适凭借敏锐的学术嗅觉发现的“虽行于世,而读之者绝鲜”^[21]的《马氏文通》的方法,总结出“言”字的三种用法:

言字是一种掣合词(严译),又名连字(马建忠所定名),其用与“而”字相似。

言字又作乃字解。……乃字是一种状字(《马氏文通》),用以状动作之时。

言字有时亦作代名之‘之’字。

此外,在《谈谈诗经》及其日记书信中对“胥”、“于”、“维”、“孔”等字也作了新的探讨。在旧说罗列中,胡适不主一家,超出家学纷争,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搜罗古人见解,不仅摆出毛《传》、郑《笺》、《诗序》的说法,而且充分吸收姚际恒、崔述、方玉润的学说并给予高度评价。胡适对《周南》11篇诗歌的解说颇为大胆,如《关雎》,认为“这一篇写一个男子思念一个女子,睡梦里想他,用音乐来挑动他。后人惯用此诗来贺初婚,故不知不觉的把这个初婚的意思读进诗里去”^[22];解





《葛覃》为“葛布女工之歌”^[29]；《汝坟》是“乱世女子流离之后，嫁了丈夫，回想那逼近王室之父母”^[30]而作的歌。其他如《谈谈诗经》中提到《野有死麋》是“男子勾引女子的诗”；《小星》是“妓女送铺盖上店陪客的诗”；《著》“是一个新婚女子出来的时候叫男子暂候，看看她自己装饰好了没有，显出了一种很艳丽细腻的情景”等等。至于在《诗经》音韵研究方面，胡适提倡要充分“利用清代古音学的结果，研究《诗》的音韵”^[31]。并写作了《论长脚韵》、《入声考》探讨《诗经》中的音韵问题。

三 胡适《诗经》研究的总结

《诗经》研究本不是胡适学术兴趣所在，但凭着他过人的眼光、魄力和在学界的独特地位，胡适的《诗经》研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突破经学范式进入现代《诗经》研究中，对《诗》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使胡适成为现代《诗经》学的奠基人。其对现代《诗经》研究的意义价值可从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两方面进行考察。

在研究成果方面，胡适的《诗》学成果普遍受到后人的重视。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者，胡适对《诗经》的基本认识为现代多数学者所认可。其摆脱传统注解，直接就《诗经》本文作出的大胆合理的解释，为后来的学者们所接受，如程俊英的《诗经译注》为《野有死麋》作的题解：“这是描写一对青年男女恋爱的诗。男的是一位猎人，他在郊外丛林里遇见了一位似花如玉的少女，即以小鹿为赠，终于获得爱情。”^[32]便明显是对胡适观点的发挥。再如，我们今天撰写《诗经》学史时，之所以能充分肯定姚际恒、崔述、方玉润三人的《诗》学成就，离不开当初胡适对他们的发现和切实宣扬。二者，开著作新体例的先河。如胡适所设计的《周南新解》的注释形式，现已成为现代《诗经》注疏的常用例。

在研究方法方面，胡适所提倡的《诗》学方法影响巨大并由此带来方法的自觉。胡适是20世纪名学人中“最先有方法自觉的一位”^[33]。他作《谈谈诗经》是为了“贡献一点”“个人研究古书的方法”，指出《诗经》研究的两条门路，并认为：“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

方法去研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解。”这实为胡适所提倡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方法在《诗经》研究中的具体演绎。胡适的《诗》学方法对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为《诗经》整理的方法。如在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所提倡的索引式整理的方法,虽然在其自身《诗经》研究中对此法未加具体实践,但这一主张得到其他学人的广泛认同,如闻一多编写《诗经字典》的打算以及哈佛燕京学社的《毛诗引得》(1934)和《毛诗注疏引书引得》(1937),都是对胡适这一主张的回应。二为对西方现代学科方法的借鉴。在解读《诗经》时,胡适主张运用歌谣、民俗学、社会学、人类学、史学等现代多学科知识作参考比较的材料,摆脱毛《传》、郑《笺》、《诗序》、朱注等等的干扰,“自己去细细涵咏原文”,认为“比较材料越多”,“《诗经》越有趣味”。如在“比兴”问题上,胡适认为“用歌谣(中国的,东西洋的)做比较的材料,可得许多暗示”。^[34]在诗篇的解读上,他用意大利、西班牙、中国的苗族“男子在女子的窗下弹琴唱歌,取欢于女子”的风俗来说明《关雎》是一首求爱诗。胡适利用民俗学方法进行《诗经》研究的实践启发了学人在进行《诗经》研究时综合运用现代多学科知识方法发掘《诗经》文化内涵,尤其是原始文化内涵,闻一多及后来的《诗经》文化阐释一派多得力于这种萌芽于胡适的研究方法;再如对西方文法的借鉴开创了《诗经》新训诂学方法的先河。在对《诗经》进行文字训诂时,胡适主张借鉴清儒比较归纳的方法,运用西方文法重新研究《诗经》中的文字,并以《诗经》中的“言”、“于以”等字词为例作出全新诠释,他将文法的应用视为“一条到宝山的山路”^[35],甚至打算要将《诗经》中所有虚字(关系词、区别词、助词)都归纳整理一番,以解决《诗经》中的文法问题^[36]。这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闻一多的新训诂学方法。在胡适的带动下,当时就出现了不少讨论“式”、“载”、“言”等字的专题研究论文,沿此一路形成了今天热门的《诗经》语言学研究。可以说胡适对方法的强调而带来的研究方法的自觉,是胡适对《诗经》研究的最大馈赠,是点石成金之术而不仅仅是一锭金子。





胡适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能抡着板斧开山劈岭却不能操着锄头深耕细作。他对《诗经》研究的展开提出了宝贵的建议，但相对于之后具体深入的《诗经》研究而言，又显得过于简单和常识化。他偏于《诗经》研究主张的提倡，而略于具体的《诗》学实践：对《小星》、《葛覃》等诗的解释离谱太远，具体字词训诂也往往引人争议；处处提倡方法，但其《诗经》研究方法却只有浅出而无深入，“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研究方式也常是引起人们争论的焦点……这些都是胡适《诗经》研究的不足之处，也是将胡适《诗经》研究一笔抹杀者的立论基点。但无论怎样，在现代《诗》学的初创期，胡适的努力是必不可少的，其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1]胡适.谈谈诗经[A]//胡适文集：第五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本文所引胡适文字凡未特殊标注者均出于此文）

[2]夏传才.《诗经》研究史概要[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3][5][10][11]胡适.白话文学史[A]//胡适文集：第八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胡适.论《野有死麋》书[A]//古史辨：第三册[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12][13][14][31][34][35][36]胡适.胡适日记全编：第三册[Z].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7][8]洪湛侯.诗经学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9][15][16][18][23][24][25]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A]//胡适文集：第三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7][26]胡适.新思潮的意义[A]//胡适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9][20][21][22]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A]//胡适文集：第十二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7]胡适.诗三百篇“言”字解[A]//胡适文集：第二卷[C].北京：北